

南诏史探 第一辑

On The History Of Nanzhao Kingdom

By Liao Deguang

南诏国史探究

廖德广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第一章 南诏国历代史实的逐年探究

按国家、朝代的历史观念,笔者所谓的南诏国(公元649~937年),含前期90年的大蒙国,及后面35年的郑、赵、杨三氏篡位的三个短促而动乱的王朝时期,是唐朝(公元618~907年)羁縻之制下的西南地区民族藩国。讲大理州、云南省、大西南的历史,必然涉及南诏国、大理国历史。大理国(公元938~1253年),是南诏国的延续。要了解南诏国、大理国历史,就有必要首先对南诏国蒙氏十三王、郑氏三王、赵杨两氏各一王,四姓十八王逐年的历史情况,进行认真的探究。

南诏国,由蒙舍诏(今巍山县南部及南涧县地区)发祥,以当时的云南郡(大体为今大理州地区)为根基,以史称的“南中”(大体为今云南省地区)为主体,地跨大西南的四川、贵州、广西,涉及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周边国家的毗邻地区。都城始终设置在苍山洱海之间钟灵毓秀的大理(曾改称西京、中都);后增设东京(又改上都)于拓东城,即今滇池之滨四季常春的昆明。

南诏国,从蒙皮逻阁“求合六诏为一”,并以“破吐蕃及弥蛮”为晋见礼,于公元738年(开元戊寅二十六年)“入朝,玄宗礼之,加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钿带七事。王归国,以兵逐洱河蛮,筑太和城,又筑大厘城,守之,尽有云南(非今云南省,指昔云南郡)之地”,成为唐朝正式的西南羁縻藩国,到公元902年(唐昭宗李晔壬戌天复二年),被重臣郑买嗣所篡,历十王,时165年。其间,“天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后,曾依附于吐蕃国(公元629~846年)四十三年,即从公元752年到794年。若从蒙舍诏主蒙细奴逻于公元649年建“大蒙国”

开始起算,共 13 王,有 254 年的历史。若再加上蒙氏王室被篡之后的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扬氏大义宁国三个动乱王朝,直到原南诏国重臣段氏后裔段思平于公元 938 年灭掉扬氏,建立大理国,则为 289 年。其实,大理国与南诏国是一脉传承的,到公元 1253 年,蒙古国军队灭大理国,前后共有 605 年的悠久历史。

南诏国及其后续的大理国,是以云南为主体的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是元代云南行中书省及后来云南省政区形成及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南诏国,在大理、云南、大西南的历史发展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历史地位卓著,长远作用巨大。

由于唐朝负责羁縻大西南的剑南节度,直接管辖南诏国的越嵩府、姚州府等的边疆大吏、钦差大臣等,不是“君臣一德,内外无欺”,而是“奸佞乱常,抚虐生变”,“恶奏”南诏国“将叛”,并不顾南诏国“不侵不叛”,只想“冀雪事由”,且“切陈丹款,至于再三”的忠诚态度。致使唐朝与南诏国之间发生了公元 751 ~ 755 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天宝战争”。第三次战役后的第二年,即公元 756 年,“安史之乱”爆发,到公元 763 年,“朝义穷蹙自杀,叛乱始平”,“安史之乱”历时长达 7 年多。对唐朝经济、社会破坏严重,并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致使唐朝从此由盛而衰。

公元 762 年开始,一心“册汉帝而继好”的南诏国王蒙阁逻凤,“随世运机”,以杰出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进行了“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的“西开寻传”,以及要“统东偏而作主”的“东统东偏”,共约四年的“观宜抚众”的开疆拓土工作。于是,南诏国的疆域为:“西开寻传,禄邾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奔湊,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这是公元 766 年蒙阁逻凤还在位时撰写刻立的,南诏国幸存下来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南诏德化碑》的记述。公元 860 年以后,由于唐朝、南诏国双方之间“以世隆之名犯太宗、元宗庙讳,唐不册封”的“国之礼仪”等方面的原因,南诏国王“致怨望”,而“两陷安南、邕

管，一入播州，四犯西川”，疆域又有所扩大。之后，南诏国疆域大体稳定，大理国则继之：西至丽水（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北达大渡河，东到贵州、广西西部，南抵今越南莱州、老挝北部一带。

南诏国，是在吐蕃国与唐朝两个强大国家争夺大西南中，“随世运机”而崛起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突厥上》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云南，即指南诏国。可见，时势使南诏国成为当时“尝与中国抗衡者四”之一的一个影响不小的羁縻列国。

要探究南诏国的历史，鉴于原始资料的缺乏，首先对南诏国历代国王在执政期间历年的重大事件及作为，作些探讨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探讨和研究的基础，是迄今对南诏国历史探讨和研究较为全面的木芹先生的《南诏野史会证》。拙著之所以称为“探究”，原因是，对笔者来说，确实属于探究；再者，是为进一步写作《南诏国史》作探究。故，凡引用《南诏野史会证》中的“野史”记载，只用引号标识；而引用《南诏野史会证》中的签证内容，及其他所有史料，均说明出处。

窃以为，立于公元766年的《南诏德化碑》中：“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随世运机，观宜抚众”；“上下一德，内外无欺”；“务德”而不“以力争”；“册汉帝而继好”；“以危易安，转祸为福”；“易贫成富，徙有之无”；“亲仁善邻”及“有国致理”等理念，应是认识和把握好南诏国历史人物、事件的要领。这既是蒙阁逻凤对以往110多年大蒙国、南诏国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后世王室的政治告诫。

南诏国处于唐朝、吐蕃国两大强国的“蚌鹬相争”之下，发展艰难曲折。近290年中，历蒙氏十三王，254年，又郑、赵、杨三姓五王，35年。可以划分为奉唐发祥、随世运机、自卫开疆、归唐继好、弱幼迷茫、特立独行、委政丧权、篡位动荡8个时期。

第一节 奉唐发祥期

公元649~公元728年,共80年。历蒙氏第一至第三世王,即蒙细奴逻、蒙逻盛、蒙盛罗皮,共3王。

李唐王朝于公元618年立国后,即于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在今云南省姚安大姚一带设置姚州,有三个属县:姚城(今姚安)、泸南(今大姚)、长明(今永仁县境内),开始经略云南西部地区。姚州,由于“洱滨人”、“焚人”与汉人融合形成的“白水蛮”等白族先民较多,经济社会与内地汉族相一致,文化生活也与汉族相近。这是唐朝之所以首先能在这里正式建置与内地一样的州、县的原因。当时鉴于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异,通常是实施羁縻政策,设置羁縻州、县。不过,姚州已地跨泸水(金沙江),不仅四周都是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众多,情况复杂,而且州内也有少数民族。故43年后,即公元664年(麟德元年五月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这是比原姚州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用以统辖姚州及今楚雄西部至大理州地区又新设置的13个少数民族羁縻州:于州、异州、五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在今大理市境内)、范邓州、野共州(今鹤庆县)、洪郎州、日南州、眉邓州、登备州(今洱源县邓川地区)、洛诺州。这13个州都在洱海北部,今大理、洱源、鹤庆一带。后又置过浪穹州(在今洱源县)、邓赅州(在今洱源县邓川地区)、越析州(在今宾川县)、沙壶州、阳瓜州、蒙舍州(均在今巍山县南涧县一带)、双祝州、江东州(在今弥渡县)等。到武后神功年间(公元697年),姚州都督府羁縻州已增加到57个。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督由朝廷派遣,且兼任都督府所在州的刺史,其他州的刺史则选当地民族首领担任。都督拥兵驻镇,统辖所属羁縻州、县的军事。政务,则由各州刺史负责。当时,唐朝由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姚州都督府、黔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彭水县)、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

河内)对云南地区分区进行经营。

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至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是吐蕃国谋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时期,并因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和亲而得以加强和发展。但主张民族联合友好的双方君王,唐太宗于公元649年,松赞干布于公元650年,相继去世之后,则进入了长达170年的时和时战的交织局面。大西南就成为吐蕃国不断进攻、企图侵占,而唐朝则努力固守、务求夺回的疆域。蒙氏“奉唐正朔”,从公元649年建立大蒙国开始,在唐朝、吐蕃国长年时和时战期间,“随世运机”,不断发展。

第一世王:蒙细奴逻,“又名独逻消”。

蒙细奴逻,即出生成长、奋斗发迹于唐朝初创时期,在位时的重大事件及作为,不仅史料阙如,所知有限;而且记载虚实混杂,错乱难辨。现,尽力予以审理。

公元617年(隋炀帝杨广大业丁丑十三年,也即隋恭帝义宁丁丑元年)。《白古通纪浅述》这样记述:“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天师观星曰:‘西南,有王者起。’上命永昌酋长弥芮忽访之。彼有九隆族第五子牟苴笃第三十代孙细奴逻者出,本名独罗消,居永昌哀牢山……”这里所说蒙细奴逻出生于“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公元629年)”是错误的。

关于“细奴逻”生年考定。从《南诏野史》记载:蒙细奴逻“于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即位,年三十二岁”推算,蒙细奴逻应生于公元617年,即隋炀帝杨广大业丁丑十三年。需要指出的是,《南诏图传》是南诏国蒙氏末代王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留下的“官方”、“王室”史料。“圣人入国授记”奇王(蒙细奴逻),因属着意伪托,故有些说法难以为信,不过,关于蒙姓自己王室始祖蒙细奴逻的生年这样重要的史实,似乎应该没有问题。据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辑录的《南诏图传》之《文字卷》中“阿嵯耶观音七化”内容的第七化中,借大唐金和尚之口说的竟然也是:“汝奇王是贞观三年己丑岁始生。”照此,

蒙细奴逻即位时的年龄就不是 32 岁,而是 21 岁。但是,通观“细奴逻,又名独逻消……唐太宗贞观初,其父舍龙,又名龙迦独,将细奴逻自哀牢避难至蒙舍川,耕于巍山”等各种相关史料的记述,蒙细奴逻的生年有两种可能:一是隋炀帝杨广大业丁丑十三年(公元 617 年);二是唐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公元 629 年)。从他儿子蒙逻盛炎公元 653 年(唐高宗李治永徽癸丑四年)就出使唐朝,如蒙细奴逻生于贞观三年己丑(公元 629 年),一是当时蒙细奴逻只有 25 岁,就有儿子可以使唐是不可能的;二是史载蒙逻盛炎公元 674 年(唐高宗李治上元甲戌元年)即位时的准确年龄为 40 岁,那么,蒙逻盛炎应出生于公元 635 年(唐太宗李世民甲午贞观九年),则蒙细奴逻 6 岁就生他,也不合常理。经反复分析判断:蒙细奴逻的生年当以公元 617 年,也就是隋炀帝杨广大业丁丑十三年为是,即位时,“年三十二岁”,与史载相符;而逻盛炎公元 635 年出生时,细奴逻约 19 岁,也合于历史上的婚育习俗。所以,《白古通记浅述》、《南诏图传》等关于蒙细奴逻生于“贞观三年己丑”之说,不知始于何时以及基于什么原因,出错了,由“十三”错为“三”,“丁”错为“己”造成。故蒙细奴逻应生于隋炀帝杨广大业丁丑十三年(公元 617 年),也就是隋恭帝义宁丁丑元年(公元 617 年)。即,“十三年丁丑”,而不是“三年己丑”。

关于避难的历史内涵。《南诏野史》:“细奴逻,又名独逻消……蒙苴笃之三十六世孙,生有奇相。唐太宗贞观初,其父舍龙,又名龙迦独,将奴逻自哀牢避难至蒙舍川,耕于巍山”的这—记载,有五项目历史内涵:一是蒙细奴逻,“又名独逻消”;二是蒙细奴逻一家避难迁移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初”(可能有误,容后论述);三是蒙细奴逻的父亲叫“舍龙,又名龙迦独”;四是蒙细奴逻家族自“哀牢”迁移“至蒙舍川(即今巍山县),耕于巍山(传说是今巍宝山前新村)”;五是迁移的原因为“避难”。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蒙细奴逻的父亲舍龙,举家迁徙“避难”,不论是真是假;到蒙舍川,不管只为活命生存,还是属卓

越的政治战略选择。总之,从此,蒙细奴逻一家迅速发展祥和崛起。

关于哀牢的两种指称。

因《南诏野史》只说哀牢,具体地点不详,后人便从两种指称着眼探讨。

一是哀牢国。方国瑜《汉·晋郡县考释》:“哀牢首邑,即今腾冲”;《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刊载:哀牢县邑,是今盈江县;以及《华阳国志》的记载:“永昌郡,古哀牢国”等论述,哀牢国的地域,在澜沧江至伊洛瓦底江之间,范围很大。蒙细奴逻一家如“自哀牢(国)避难至蒙舍川”,具体从哀牢国何处避难来呢,史籍均没有确指。杨浚在其《阿昌族与南诏文化》一书中,经论述、判断、分析认为,是从澜沧江流域的今云龙县一带避难而来。

二是哀牢山。哀牢山系,延袤八百多千米,如蒙细奴逻一家“自哀牢(山)避难”而来,具体从哀牢山的什么地方来也没有确指。黄宜在《对唐初有关蒙舍诏几件事的刍议》一文中,则论指为哀牢山首部地区,即今南涧县、景东县、弥渡县、南华县的结合部。《白古通纪浅述》也明确记载为:“细奴逻者出,本名独罗消,居永昌哀牢山。”

关于避难的两种说法:

一是为避“永昌酋长弥苻忽”尊“上命”,“访知其异,而力求之甚”危难的古说。《白古通纪浅述》这样记述:“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公元629年),天师观星曰:‘西南,有王者起。’上命永昌酋长弥苻忽访之。彼有九隆族第五子牟苴笃第三十代孙细奴逻者出,本名独罗消,居永昌哀牢山。其母摩利羌,往龙泉浣衣,若有所感而娠。生九子,八子皆随其父龙迦独化龙而去,惟独罗消以母所爱而乞归。永昌酋长访知其异,而力求之甚。其仆有波洗者,善为计策。以己子与独罗消一日生者,名细奴逻抵独罗消名,交使者领讫。仆遂杀一牝犬,夸其腹而包独罗消以掩其光,仍令犬子啣乳。使者复搜其家,别无小儿而反。仆即取出独罗消,名襁褓窃,负而逃于蒙舍。细奴逻,自在襁褓。至于蒙舍,日渐长成,娶蒙织,生男

逻晟(盛)。”黄宜在《对唐初有关蒙舍诏几件事的刍议》一文中分析说:拂去前人渲染的神秘色彩,记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蒙氏家族,在细奴逻的祖、父之世,即已是哀牢山首部地域上“僂”族中分支出来的“哀牢九族之一”的首长了。否则,怎么会“仆有波洗”。当蒙氏一支日益发达,大酋长势必要“滥用古代氏族制度以维护对财富的暴力掠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以,派人夺杀后嗣,这当即是蒙细奴逻一家及部分族人避难的因由。如是,则“自何处迁来”及“避难因由”两个问题都有了答案。

二是为避蒲蛮“尽灭其族”之难的今说。杨浚在《南诏与阿昌族文化》一书“哀牢人的东迁和南诏的崛起”部分中论述:蒙细奴逻一族是阿昌族先民,进入巍山的“哀牢人”并非细奴逻一家,而是一大批阿昌族先民“蒙撒人”和“蒙寻人”亲属部落,后形成蒙舍诏和蒙嵩诏。“蒙撒”与“蒙舍”同音,“蒙寻”与“蒙嵩”同音,绝非偶然。还论述:今云龙县旧州地区为古哀牢国故地,是阿昌族先民浪峨人的聚居区。公元5~6世纪时期,蒲蛮势力强大后,沿澜沧江向上游拓展,与浪峨人发生激烈冲突。蒲蛮酋长底弄,不仅残酷攻灭浪峨酋长猛腊(蒙腊),还要“尽灭其族”,就连已经出嫁早姓人家的女儿也不放过。参与抵抗的浪峨人部落,为避难,纷纷向东迁徙。古哀牢国地区的浪峨人,不仅进入蒙舍川,建立蒙舍诏和蒙嵩诏;也进入洱海西北的今云龙东部、洱源、剑川、兰坪等地结合部的山区,他们是施氏部落和丰氏部落。后进一步进入平坝地区,建立了“浪穹”、“施浪”、“邓嗽”三个浪人诏。也与史实有着一定的联系。

总之,随末唐初,世事动乱,西南地区也难置身局外,酋长及各部落间的争斗,是比较普遍的。蒙细奴逻的父亲舍龙率家族及部分部族,不论为避什么难,不论从哀牢国还是哀牢山,其实,哀牢山地区当时也属哀牢国,迁徙到蒙舍川,当是历史的真实。

窃以为,樊绰《蛮书·六诏第三》中的记载:蒙异牟寻“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的说法很明

确：蒙氏家族“本永昌沙壶之源”。他为什么要这么“自言”？因“沙壶”是唐朝曾经设置过的一个州：沙壶州。而沙壶州、阳瓜州、蒙舍州，均在今巍山县、南涧县一带。这是南诏国的发祥之地。言外之意：南诏国本是唐朝的域内之地，蒙氏王室及百姓本是唐朝的汉室臣民，怎么被当“外”了？应“君臣一德，内外无欺”！这是否“君臣一德，内外无欺”，是《南诏德化碑》在“为明不得已而叛”唐列举事实、辨析是非的主要论点和立足点，因“奸佞乱常”被当“外”，因而被“欺”，是南诏国特别在意和不能接受的一个客观实际。

关于避难的时间问题。如“襁褓”之说正确，则应该是公元617年（隋炀帝杨广大业丁丑十三年、隋恭帝义宁丁丑元年），或公元618年（隋恭帝义宁丁戌寅二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即隋朝灭亡、唐朝立国的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期间。“其仆有波洗者……仆遂杀一牝犬，夸其腹而包独罗消以掩其光，仍令犬子啣乳。使者复搜其家，别无小儿而反。仆即取出独罗消，名襁褓窃，负而逃于蒙舍”之说可信。若“太宗贞观三年己丑（公元629年）”之说不错，则蒙细奴逻就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十二三岁的少年。窃以为，隋末唐初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期间，因某种原因，为避难，“名襁褓窃，负而逃于蒙舍”，也许含有历史真实的信息。

公元648年（唐太宗戊申贞观二十二年）。《旧唐书·本纪》记载：“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丁巳，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部分记载：“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将军梁建方讨蛮，降其诸屯七十二所，户十万九千三百，遣使往西洱河。”显然，19年之说不确。因《新唐书·本纪》、《册府元龟》的记载都是“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对此，方国瑜先生曾论说：可能刘伯英“松外诸蛮，虽暂降附，旋即又叛，请击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的上书，在十九年；而派梁建方出兵在二十二年。

公元649年（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奴逻素有祥异，

会唐封首领大将军建宁国王张乐进求，以诸葛武侯所立白崖铁柱岁久剥蚀重铸之。因社会祭柱，柱顶故有金镂鸟，忽能飞，集奴逻左肩，相诫勿动，八日乃去。众骇异，谓天意有属。进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于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即位，年三十二岁。建号大蒙国，称奇嘉王，据南诏”。

关于“细奴逻”名号问题。按黄宜在《对唐初有关蒙舍诏几件事的刍议》一文中论述：蒙氏家族，在细奴逻的祖父（舍龙）、父亲（龙迦独）之世，即已是生息于哀牢山首部地域上所谓“哀牢九族之一”的酋长了。细奴逻本名“独逻”，细奴逻及习农乐、细农罗、细诺罗等其他记音，是称号。细、习等，都是彝语氏族部落祭师（巫师）及酋长“西”的汉字记音；奴、农等，当是黑色“诺”的记音；而逻、乐等，是虎的意思。因此，“细奴逻”这一名号的含义是黑虎族的祭师（巫师）及酋长。

关于“素有祥异”的问题。古代，部落首领总是一身而兼祭师（巫师）及酋长二任的，而且是世袭的。因此，他们有广泛的宗教、政治、生产、生活知识及技能传统。会巫术，能治病，果敢决断，颇有预见。其祭师（巫师）及酋长的家庭出生、身份等决定的不凡言行，在普通百姓眼中，自然是“素有祥异”。

关于张乐进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问题。显然与唐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丁巳，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户十万九千三百，遣使往西洱河”的固土收疆之举，不无关系。这就是说，蒙氏王室是在唐朝的暗中支持下，以张乐进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的冠冕堂皇的“禅让”形式得国的。由此看来，蒙氏“唐太宗贞观初……自哀牢避难至蒙舍川”，在仅 21 年的时间里，确实善于“随世运机，观宜抚众”，因“遵唐正朔”而迅速发祥和崛起。

关于“号大蒙国”问题。据熊建平《南诏王为何族——从一枚铜印说起》知：公元 2003 年，在巍山县“飞来寺”出土了一枚“铜印”，上刻一高 2.5 厘米，宽 2 厘米的楷书“蒙”字。虽有轻度腐

蚀,但依旧十分完整。“铜印”出土地点,在今巍山县城北三里处的贝忙村的降龙山。传说,蒙舍龙父子曾在此筑过土城,并有上天帮助,叫“飞来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人还在遗址上挖出砖石、瓦砾。这枚“铜印”,是农民在放牛时发现的。初步判断:应该是唐代蒙细奴逻时的产物。也许是以蒙性命国名而“号大蒙国”的佐证。

蒙细奴逻开国“时,激(澄)江人波罗傍有经济之才,用为文臣;郭郡矣素以勇略闻,用为武臣。又有杨波远者,相传为东汉时人,常骑三角青牛,号神明大士,能知盐泉。滇中盐泉多为波远所开创”。《白古通纪浅述》记载:“有郭邵实(即郭郡矣)者,以武功佐奇王;又有波罗傍者,以文德辅奇王。波罗傍出于激江之滨,衣锦衣,执书三卷:一、《非人书》;二、《波奢伽书》;三、《紧那舍》,为蒙国之书。”此记载蕴涵着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蒙细奴逻确实是卓越的开国之君,不仅依仗武功,而且重视文治,有大蒙国自己的教化之书;他还“劝民众习读汉书,敦崇八行”。二是东汉时,云南境内的井盐就有多处开采,多为杨波远开创。至今,有些古盐矿的村庄还有杨波远的神庙,受到顶礼膜拜。与唐朝经略云南,不仅是个疆域问题,而且还有盐铁之利同理,从蒙细奴逻起,南诏国历代国王都极其重视盐业及盐泉之地,甚至为之争战。蒙皮逻阁“破吐蕃及弥蛮”,对安宁雄镇的处心经营,以及“越嵩再扫”和“回旆昆明(今盐源县一带)”等都是。

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庚戌永徽元年)。蒙细奴逻于“高宗庚戌永徽元年,建都于蒙舍川,于珑玕图山筑珑玕城”。珑玕图城,是大蒙国的都城,遗址在今巍山县庙街乡珑玕图山。1993年11月16日,被批准为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651年(唐高宗李治辛亥永徽二年)。“大勃弄(今凤仪镇、弥渡县一带)酋杨承颠寇麻州(今马龙县一带),唐命郎州(今贵州遵义)道行军总管赵孝祖讨之。孝祖先入小勃弄(今祥云县一带),酋长歿盛迎战,孝祖斩之。进至大勃弄(今弥渡县一带),

攻其城，破之，擒杨承颠。改云南县为匡州，领勃弄、匡州二县”。对“大勃弄酋杨承颠寇麻州”，《新唐书·本纪第三·高宗》有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八月己卯，白水蛮寇边，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以伐之……十一月，赵孝祖及白水蛮战于罗佺侯山，败之。”对此，《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记述更翔：“大勃弄杨承颠私署将帅，寇麻州，都督任怀玉招之，不听。高宗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至罗佺侯山，其酋秃磨蒲与大鬼主都干以众塞箐口，孝祖大破之。”后来，“孝祖按军，多弃城，遂北至周近水，大酋长佉弥于、鬼主董朴滨水为栅，以轻骑逆战”。仍然失败，“孝祖击斩弥于、秃磨蒲、鬼主十余级”。并因时遇大雪，当地军兵“皴冻死者略尽”。

所谓鬼主。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中述及：“南诏初期之宗教为巫教，盖羌之宗教，已即中国西部夏民族最古之宗教也。当部落时代，政教杂糅，宗教领袖即政治领袖，宗教祭司即部落酋长。此种酋长，在西南者名曰耆老、鬼主、又曰兮幡。因各部落多彼此不相统属，故每一部落皆有其鬼主，而较大部落之鬼主，则称大鬼主，或都鬼主。皆从氏族社会中之‘长老’演变而来。”鬼主，还是东汉末年汉中地区张鲁创立的太平五斗米教（天师道教）传教人的道号。诸囊头称鬼主，大鬼主，既是部落的宗教首领，也是政治酋头，当与其统辖的东、西两囊民族巫教信仰及信奉此“鬼主道教”有关，且在昆明族分布地区，是颇为流行。而李唐王室，也奉道教为国教。“兮幡”，是“耆老”的白族语。

公元652年（唐高宗李治壬子永徽三年）。孝祖由于严酷的征讨，进军顺利，便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诱弄栋叛，今因破白水，请遂西讨。”获准后，“孝祖军人，夷人皆走险”。所谓“夷人皆走险”，显然是受到全面而顽强的抵抗。然而，“小勃弄酋长歿盛，屯白旗城，率万骑战，败，斩之。进至大勃弄，杨承颠婴城守，孝祖招之，不从。挥军进，执承颠。余屯，大者数万，小者数千，皆破降

之,西南夷遂定。”(《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对“今因破白水,请遂西讨”,《新唐书·本纪第三·高宗》也有记载: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四月庚寅,赵孝祖及白水蛮战,败之。”

任何社会单位,不论部落还是国家,都会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为生活环境、经济资源谋求安全,追求强大。此次“大勃弄酋杨承颠寇麻州”,应与三年前梁建方乘“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的浩荡声势,“遣使往西洱河”,支持蒙细奴逻,培植大蒙国;而“洱河蛮”“白水蛮”诸“白子”部落则因出于自身的利益,“常诱弄栋叛”,而遭受冷遇,甚至受到警告之后引起的不满乃至不安有关。顺为臣民,反者寇,大概是任何占领者、执政者对辖区民众的基本看法。“高宗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的强硬而残酷的“破白水”及进一步的“西讨”而“皆破降之”,则是新生不久的唐朝出于在“西南夷”藩屏地区打击乃至消灭“抵制”势力,保护以及支持“向化”力量的一次固土拓疆之举。对叶榆国、张氏白国后裔“白水蛮”、“洱河蛮”等白族先民来说,则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可谓分崩离析。但是,对于“乌蛮”蒙细奴逻及其大蒙国的进一步崛起来讲,则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关于“白水蛮”等白族先民,《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记载:“爨蛮之西,有徒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今禄丰至双柏一带)、望(今广通一带)、览(今年牟定至楚雄一带)、丘(今武定一带)、求(今玉溪一带)五州,隶郎州(今贵州遵义)都督府。白水蛮,地与青蛉(今永仁、大姚)、弄栋(今姚安)接,亦隶郎州。弄栋西有大勃弄(今弥渡县一带)、小勃弄(今祥云县一带)二川蛮,其西与黄(当为阳)瓜、叶榆、西洱河接,其众完富与蜀埒。”

征讨大勃弄杨承颠及继续西讨,没有任何蒙细奴逻参与的记载,好像“不作为”。也许是当时的大蒙国,仅只是受到唐朝的暗

中支持,蒙细奴逻还没有受到唐朝的正式册封,尚师出无名。加上其政治影响,军事实力也还有限,真正能够管理控制的地盘仍然只是蒙舍诏而已,这由往后一段时间的史实可以佐证。

公元653年(唐高宗李治永徽癸丑四年)。“永徽癸丑四年,遣罗盛炎入朝唐。诏授奴逻为巍州(即今巍山县南部)刺史,赐以锦袍”。从此,蒙氏受封,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开始公开化。但也仅仅是地置巍州,官授刺史而已。

公元654年(唐高宗李治永徽甲寅五年)。“蒙逻晟,奴逻子,上元元年立,年二十。”即细奴逻立逻晟为世子。而且,据木芹先生在《南诏野史会证》细奴逻部分的签证中论证:“永徽五年或显庆元年(公元654年或公元656年),遣其子罗盛入朝,谢赐命为可信。”即公元654年或公元656年,蒙细奴逻再次遣其已立为世子的儿子蒙罗盛入朝,“谢赐命”,继续加强与唐朝的联系,争取唐朝的支持,并以此扩大影响,树立形象。

公元657年(唐高宗李治显庆丁巳二年)。“高宗显庆二年,凤鸣于浪穹罗浮山,乃改名为凤羽山。封十二圣贤为十二山神”。浪穹州(今洱源县)罗浮山,今名罗坪山。所谓“罗浮(落凤)山”、“凤羽山”,其实,是自古有名的一处鸟类迁徙必经“鸟道”。古称吊鸟山、鸟吊山,此两名汉时即有。《水经注》叶榆水部分有记载:“益州叶榆河出其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县,故滇池,叶榆之国也。汉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开之,以为益州郡。郡有叶榆县,县西北八十里有吊鸟山,众鸟千百为群共会,鸣呼啁晰。每岁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则止,一岁六至,雉雀来吊,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嗾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鸟,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集吊,因名吊鸟。县之东有叶榆泽,叶榆水所钟,而为此川藪也”。现,山不名凤羽,但相关地名较多,如凤羽街、凤羽河、凤羽村、凤羽镇等。中华民族有龙凤崇拜,讲“龙凤呈祥”。借高耸入云,雾气弥漫,势连苍天及“百鸟朝凤”的鸟类迁徙神秘现象而改山名,是喻且图蒙氏王室的神圣与吉祥。《康熙蒙化府志》载:“先有骠苴

低,子低弁菑,生九子。惟第五子贤而黠,生十二子,五贤七圣。传三十六代,至龙迦独,生独逻消(细奴逻)。”由此则知,十二圣贤是细奴逻的先祖。“封十二圣贤为十二山神”,是着手进行蒙氏王室非凡形象的塑造。

公元664年(唐高宗李治麟德甲子元年)。《通典》卷一八七记载:“大唐麟德元年五月,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旧唐书·本纪》中也有记载,时间明确为“五月乙卯”。置姚州都督府,距设置姚州已有43年,是为了有效地统辖当时又不断建立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羁縻州。在置州基础上设置高一级的府,看来确实有效,到公元697年便增加到“姚府总管五十七州”。

公元670年(唐高宗李治咸亨庚午元年)。《新唐书·本纪第三·高宗》记载:“咸亨元年四月癸卯,吐蕃陷龟兹,拔换城,废安西四镇。”《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也记载:“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废。”

以“西海”(今青海省)为中心的羌族,是一个古老的大游牧民族,和汉族的传说时代就有来往。到了商朝,屡见于卜辞。周朝以下,史书记载愈益翔备。150个聚散无常的羌族原始部落,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组成了土谷浑、苏毗、吐蕃等国家。到吐蕃第三十二世赞普弃宗弄讚(号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公元629~公元650年),战胜了其国内外敌对势力,建立了统一的吐蕃国,是当时亚洲一个强盛的军事政权。对外用兵,四处扩张。西面,征服了尼泊尔,扩张到当时印度的边界;北面,侵占了突厥的大片领土,并攻占了唐朝在中亚的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安西四镇”,一度阻断了唐朝与西域的交通与贸易。《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记载:为了遏制吐蕃,咸亨元年四月辛亥,唐朝“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即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然而,七月,“薛仁贵及吐蕃战于大非川”,他们所率之“师凡十余万”为吐蕃大将“钦陵所据,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

尽有其地”。吐蕃完全征服了那一地区的羌及党项等民族。薛仁贵等将领为此“并坐除名”。

吐蕃不仅侵犯唐朝的西北地区，其势力也不断东向西川、南下洱海地区扩张。于是，大西南地区，不时处于吐蕃与唐朝双方的激烈争夺乃至残酷征讨之中。

一些文章，都提到蒙俭作乱，李义讨击之事。但都没有时间，也不讲有何依据。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二章邃古期、第八节唐时期、(丙)高宗时代，专门以 C、李义击姚州为题，论及：“永徽五年，西洱河蒙俭和舍等作乱，以李义为姚州道总管，讨之。斩其帅诺没弄、扬虔柳等。《南蛮传》、《资治通鉴》不载此事，今依《滇略》系于此年，不知谢氏何所据也。”笔者原以为是另一次作乱，后在一次又看张柬之《请罢姚州屯戍表》中：“姚州本龙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死于群蛮。诏遣郎将赵武贵讨击，兵无噍类。又以将军李义揔继往，而郎将刘惠基战死，其州遂”的记述时，才恍然大悟，并从《王仁求碑》等史料查证，这是发生在公元 670 年（即唐高宗李治咸亨庚午元年）的叛乱，而不是“永徽五年”（公元 654 年）。有郎将赵武贵、将军李义揔（有关史载漏揔）、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先后三任姚州道行军总管奉命讨击，最后由梁积寿平定。当时，洱海西部的“蒙嵩一诏”，不仅“最大”，而且与吐蕃关系密切，常南北呼应。蒙嵩诏主、阳瓜州刺史蒙俭等，乘机攻陷姚州以西二十余州，姚州长史李孝让、辛文协被杀，震动了朝野。以至西川部分地区和洱海北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吐蕃国的势力范围。“西洱河蒙俭、和舍等”的这次叛乱，持续了 3 年。唐王朝先期征调的陇西、天水、川、陕等地的二十万兵力，无法平定，“郎将赵武贵讨击，兵无噍类。又以将军李义揔继往，而郎将刘惠基战死”。

公元 672 年（唐高宗李治咸亨壬申三年）。“西洱河蒙俭、和舍等”的叛乱才被唐朝第三次派出的梁积寿，依靠当地的西爨白蛮大姓酋长、河东州刺史王仁求，予以击败。《新唐书·本纪第